

文稿

中國古代圖書牌記廣告之設計探析

趙惠芬\*

摘要

中國古代圖書所附載的廣告內容豐富，包含了牌記廣告、序跋廣告、書名廣告、書目廣告及徵稿廣告等多樣形式，這不僅反映了書商的商業經營活動，同時可看出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脈絡，亦為中國出版文化研究的重要資料。本文擬對牌記廣告的式樣與位置、牌記內容，做初步的探討和分析。

關鍵詞：中國古代圖書、牌記、廣告

一、前言

牌記，如同封面、目錄、序跋一樣，是古籍構成的一個重要部分。葉德輝在《書林清話》卷六《宋刻書之牌記》云：「宋人刻書，於書之首或序後、目錄後，往往刻一墨圖記及牌記。其牌記亦謂之墨圍，以其外墨闌環之也。又謂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元、明以後，書坊刻書多效之，其文有詳有略。」<sup>1</sup>除葉氏所舉外，牌記還有木記、木牌、書牌子等異名。牌記最初的功用是一種標誌，即借助簡單的文字或圖形與文字，向讀者傳達該書印刷出版的簡要資訊。然而，隨著圖書交易的不斷發展，在字體的選擇、圖形佈局等安排，也愈具匠心。張積在〈宋元刻本的牌記廣告〉一文<sup>2</sup>曾歸納牌記承載的三項功能，分別是：(一)版權聲明功能，宋刊本《東都事略》的牌記文字是：「眉山程舍人宅刊本，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即是一則典型的版權聲明；(二)商標功能，牌記的圖形、構圖、裝飾樣式甚為豐富，並採取了正書、行書、隸書、篆書、草書等多樣化的書體，就圖案整體的裝飾效果來看，已具備了徽標的特徵；(三)廣告功能，牌記的文字長短不等，或簡單陳述，或曲折介紹，或極力渲染，在文字內容和語言風格上，書商為了吸引讀者購買，在牌記這塊得以的宣傳的方寸之地，盡行設計之能事。

二、牌記式樣與位置之設計

古代圖書牌記的式樣繁多，前面葉德輝之文已經論及，但略嫌籠統。傅增湘的《藏園群書經眼錄》、王重民的《中國善本書提要》、林申清編的《宋元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sup>1</sup> 葉德輝撰，《書林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152頁。

<sup>2</sup> 張積撰，〈宋元刻本的牌記廣告〉，《廣告大觀(理論版)》，2006年第1期，第96頁。

書刻牌記圖錄》及一些論及圖書版本鑑定或介紹的書籍，提供了豐富、直觀的材料，茲歸納於下。

#### (一)長方形

這是最常見的一種形式，數量最多。分為有墨圍與無墨圍兩類。無墨圍者，即文字四周沒有刻印墨欄，如同沒有邊緣的印章，如：宋乾道六年(1170)洪氏刻本《洪氏集驗方》和元至正五年(1345)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書蔡氏傳旁通》的牌記。有墨圍者，通常是由單欄或雙欄形成長方形墨圍，中間是行數不等的廣告文字。單欄的墨線較為粗黑，雙欄的墨線則外欄粗黑、裏欄纖細<sup>3</sup>。另有長方形牌記的一種變體，是直接用墨線刻成一個「亞」字，或在單欄墨圍的四角各畫一條弧線，從而形成一個「亞」字<sup>4</sup>，例如：宋廖瑩中刻《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末<sup>5</sup>及《昌黎先生集》卷第一末<sup>6</sup>有「世綵廖氏刻梓家塾」亞字形牌記。

#### (二)碑形

這種牌記模擬石碑的形制，上方是螭首圖案，下端是負碑的龜座圖案，碑身是刻印廣告文字的地方。選用這種形式，一則可以詳細介紹圖書資訊，再則顯得莊嚴穩重。宋刻梵夾裝《妙法蓮華經》<sup>7</sup>和蒙古定宗四年(1249)張存惠魏卿晦明軒刊本《重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的牌記即為碑形<sup>8</sup>。

#### (三)鼎形

以裝飾性圖案刻成此形，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葉氏廣勤堂刻本《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sup>9</sup>即有此種牌記。

#### (四)鐘形

以雙欄墨線刻成此形，元代町郡覆刻南宋廖氏世綵堂本《孟子》、元代建安余氏勤有堂刻《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sup>10</sup>及元延祐四年(1317)圓沙書院刻本《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sup>11</sup>即有此種牌記。

#### (五)琴瑟形

<sup>3</sup> 張積撰，〈宋元刻本的牌記廣告〉，《廣告大觀(理論版)》，2006年1月，第97頁。

<sup>4</sup> 見張積撰，〈宋元刻本的牌記廣告〉，《廣告大觀(理論版)》，2006年第1期，第97頁。

<sup>5</sup> 《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宋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年)，第41頁。

<sup>6</sup> 《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家刻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年)，第51頁。

<sup>7</sup>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868頁。

<sup>8</sup>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80頁。

<sup>9</sup> 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123頁。

<sup>10</sup> 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109頁。

<sup>11</sup> 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93頁。

元刻本《魁本大字詳音句讀孟子》題辭後即有琴式牌子，題「廣陽羅氏鼎新刊行」八字<sup>12</sup>。

#### (六)荷蓋蓮座形

明代圖書牌記的式樣。以荷蓋蓮座形最為常見。最早的荷蓋蓮座牌記在北宋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中即已出現，但其內無字。至明代盛行，如明嘉靖十六年(1537)劉氏安正書堂刻本《經史通用古今直音》四卷，目錄頁後有荷蓋蓮座牌記，刊「嘉靖丁酉歲安正書堂刊」。明末楊氏清白堂刻本《全漢志傳》，則為一童子手執荷蓋蓮座牌記，刊「清白堂楊氏梓行」，惟妙惟肖<sup>13</sup>。

至於牌記的位置，並不固定。或置於封面，如：元代劉氏翠巖精舍刊印的《廣韻》，封面文字云：

翠巖精舍校正無誤新刊足注明本廣韻五音四聲切韻圖譜詳明至正丙午  
仲夏繡梓印行<sup>14</sup>

或置於序後，不論是作者的自序或他人的序文，序文通常放在目錄的前面，以示鄭重。例如：宋代劉氏天香書院刻《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論語》、元代平陽張宅晦明軒刻《增節標目音注精義資治通鑒》<sup>15</sup>等書的牌記皆為此例；或置於目錄前，例如：明刻本《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目錄前有牌記云：

《宋史通鑒》一書，見刊本者節略太甚，讀者不無遺恨焉，本堂今得善本，乃名公所編者，前宋已盛行於世，今再繡諸梓，與天下士大夫共之，誠為有用之書，回視它本，大有徑庭，具眼者必蒙賞音，幸鑒。<sup>16</sup>

或置於目錄後，例如：宋刻《新編近時十便良圖》的牌記在綱目後，而宋刻麻沙本《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集》的牌記在目錄後<sup>17</sup>。或置於某卷卷尾，例如：宋刻《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有牌記曰「饒州德興莊溪參龍應夢集古堂善本」，而各卷後還另有牌記，文字不一，如：卷二十八後曰：

饒州德興縣莊溪書癡子董應夢重新校證，寫作大字，命工刊板，真用皮紙印造，務在流通，使收書英俊得茲本板，端不負於收書矣。紹興庚辰除日因筆以記志歲月云。

卷三十二後曰：「饒州德興縣莊溪藍應夢宅經史局逐一校勘，寫作大字，命工

<sup>12</sup>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4頁。

<sup>13</sup>見李瑞良撰，《中國出版編年史》上卷(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50頁。

<sup>14</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118頁。

<sup>15</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5頁、第81頁。

<sup>16</sup>曹之撰，《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38頁。

<sup>17</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13頁。

刊行」<sup>18</sup>，而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八年吳郡袁嘉趣堂刻本《六家文選》更有五個牌記之多，第一個在序後，云：

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

第二個在卷三十後，云：

皇明嘉靖壬寅四月立夏日吳郡袁氏兩庚草堂善本雕。

第三個在卷四十後，云：

此蜀郡廣都裴氏善本，今重雕于汝郡袁氏之嘉趣堂。嘉靖丙午春日。

第四個在卷六十後，云：

吳郡袁氏善本新雕。

第五個則在書後，云：

余家藏書百年，見購鬻宋刻本《昭明文選》有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白文、大字、小字殆數十種，家有此本，甚稱精善，而注釋本以六家為優，因命工翻雕，匡郭字體未少改易，刻始於嘉靖甲午歲，成於己酉，計十六載而完。<sup>19</sup>

此外，尚有置於全書卷尾的，宋代臨安榮六郎刻《抱朴子》卷末的牌記，文曰：

早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翰經史書籍鋪，今將京師舊本《抱朴子》內篇校正刊行，的無一字差訛。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幸賜藻鑒。紹興壬申六月旦日。<sup>20</sup>

由上可知，只要有空白，書籍的任何位置，都可以刊刻牌記，或為了確立書業商號的品牌地位，並加強宣傳的力度，或為了防止嗜利之徒挖去原書的牌記，自古以來鑒定古籍的方法，審定牌記即為參考依據之一。

### 三、牌記內容之設計

#### (一)說明圖書出版情況

此類廣告字數較少，發佈的資訊主要是：刊印書籍的坊鋪名稱或地點、時間、主持人姓名或校勘人姓名、簡要的說明等。例如：宋刻本《衛生家寶產科備要》卷末有牌記文字三行，云：

長樂朱端章以所藏諸家產科經驗方編成八卷，刻版南康郡齋。淳熙甲辰歲十二月初十日。<sup>21</sup>

<sup>18</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5頁。

<sup>19</sup>曹之撰，《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42頁。

<sup>20</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11頁。

<sup>21</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1頁。

宋刻《新編近時十便良方》總目後有牌記文字二行，云：

萬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本，庶便檢用，請詳鑒。<sup>22</sup>

宋刻《洪氏驗方集》卷末的牌記文字云：

右集驗方五卷，皆予平生用之有著驗或雖未及用而傳聞之審者。刻之姑熟，與眾共之。乾道庚寅十二月十日番陽洪遵書。<sup>23</sup>

又如：宋淳熙三年(1176)舒州刻本《大易粹言》牌記云：

今具《大易粹言》一部，計二十冊，合用紙數印造工墨錢下項：紙副耗共一千三百張，裝背饒青紙三十張，背清白紙三十張，棕墨糊藥印背匠工等錢共一貫五百文足，賃板錢一貫二百文足。庫本印造，見成出賣，每部價錢八貫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sup>24</sup>

對於字形大小、用紙規格、質地、數量、工價等，清楚標列，以鼓勵消費者購買。有些牌記廣告在內容上，著重交代編刊緣起，突出該書的優點及特色。例如：明弘治七年(1494)安正堂刻本《新增說文韻府群玉》二十卷，凡例後牌記刊云：

是書元大德丁未端陽陰先生所編，板行久矣，至於皇明正統間梁氏安定堂重刊於各字下續增許氏說文，雖加詳明，然中間未免差舛闕略，觀者不能無憾。本堂三複加校，考至上聲七鹿韻，內堵字韻起，至去聲十七霰字韻止，凡二千三百有奇，並闕說文，今悉增入，幸得其全，收書君子，但將原書對校，了然悉備，總龜於斯，不煩考之他韻，敬梓以行，嘉與四方共之。弘治甲寅孟夏，劉氏安正書堂謹識。<sup>25</sup>

上文詳盡敘述了《說文韻府群玉》一書的版刻源流及存在的舛誤，介紹了新刊本的優點，希望引起讀者重視。

## (二)強調版本之善

宋人特別講究版本，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即以著錄不同的版本見長。其於一書列多種版本，如成都石經本、秘閣本、舊監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等。宋代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間或論及版本，對一些重要的版本都要特別拈出，加以說明。這表示在宋代讀書人心目中，版本問題佔有重要的位

<sup>22</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13頁。

<sup>23</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7頁。

<sup>24</sup>曹之撰，《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35頁。

<sup>25</sup>沈津撰，《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第274至275頁。

置，而在這種氣氛中，印刷出版業對版本給予高度重視也就不足為奇了。如：宋慶元三年(1197)建安余氏刻本《重修事物紀原集類》牌記云：

此書系求到京本，將出處逐一比校，使無差謬，重新寫作大板雕開，並無此一字誤落。時慶元丁巳之歲建安余氏刊。<sup>26</sup>

以當時聲譽好的「京本」作號召，吸引讀者。又如：平陽張宅晦明軒蒙古憲宗三到五年所刻《增節標目音注精義資治通鑒》序後有長方形牌記云：

《通鑒》一書，學者常病卷帙浩繁，未易遍窺，往往采摭切要，以便披閱。然或好尚不同，去取各異。惟此本實東萊先生親節，詳而不繁，嚴而有要，標目音注，各有條理。然其間聞人異事，嘉言善行，間有遺脫者，證以監本，悉為補入。又每卷末各附溫公《考異》，隨事增以諸儒精議。及諸綱目，其舉要歷，則見歷代之年數。其君臣事要，則為事類之領會。又如紀傳要括，秘承《外紀》。問疑、釋例、世系、地理圖之類，皆甚精要。比之諸本加數倍矣，纖悉備具，靡有缺遺。不欲私藏，爰攻梓以與天下賢士夫共之。泰和甲子下癸丑歲孟冬朔日平陽張宅晦明軒謹識。<sup>27</sup>

以近三百字的文字來介紹底本來源、優點、校勘增補情況，簡介體例、刊刻目的等是比較少見的。

### (三)聲明校勘之精

校勘是圖書出版中的重要環節，書籍只有經過校勘，才可以減少錯誤，提高學術價值。因此，書商常以校勘之精審為賣點，招徠讀者。例如：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璩氏燕石齋重修本《蘇長公外紀》十二卷，序後有刊誤牌記云：

是刻初屬諸名士刊定，乃為傭書謬誤，春霖掩關，反復研勘，得六十餘字，命梓補正。昔人謂校書如掃落葉，隨拂隨有，信然哉！覽是編者，若有遺誤，不妨指示，再加厘正。廿三年乙未璞又識。<sup>28</sup>

此言強調該書經過「反復研勘」後「命梓補正」，並提出「若有遺誤，不妨指示，再加厘正」的請求，其實也是一種為圖書宣傳的廣告手法。有的牌記還兼及校勘說明，以傳達該版本的學術價值。例如：宋刻本《揮塵錄》卷後的牌記文字云：

<sup>26</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16頁。

<sup>27</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107頁。

<sup>28</sup>沈津撰，《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第274至275頁。

此書浙間所刊，此前錄四卷，學士大夫恨不得見全書。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帙四錄，條章無遺，誠冠世之異書也。敬三復校正，鋟木以衍其傳，覽者幸鑒。龍山書院謹咨。<sup>29</sup>

宋刻《春秋公羊經傳解話》序後的牌記文字云：

《公羊》、《穀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厘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婦」，「含」作「唵」，「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度」。若此者眾，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sup>30</sup>

在抄本時代，書籍在傳抄過程中會出現許多錯誤，在印本時代，書籍同樣會存在許多錯誤。於是，在出版書籍的過程中，校勘就成爲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書籍只有經過校勘，才可以減少錯誤，提高可閱讀性，從而傳播正確的知識，增強學術價值。葉夢得曾談宋祁校《漢書》的情形，說：「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sup>31</sup>南宋岳珂刻《九經三傳沿革例》時，一書版本竟達到二十三種之多。校勘既被讀書人如此看重，印刷出版者就把它作爲重點進行宣傳，以「精加校正」、「三複校正」、「的無差錯」的承諾相標榜。宋刻《後漢書》的廣告云：

時嘉定戊辰季春既望，刊於一經堂。將諸本校證，並無一字訛辨。建安蔡琪純父謹咨。<sup>32</sup>

這則廣告以簡約的文字、精煉的語言，對重點資訊進行發佈，除標舉店名之外，該書的校勘情況，更是他要傳佈的重要資訊。從現有材料來看，宋代許多牌記的敘述結構和語言，有明顯的格式化傾向，例如，建安余氏刻本《重修事物紀原集》的牌記文字云：

此書系求到京本，將出處逐一比校，使無差謬，重新寫作大板雕開，並無一字誤落。時慶元丁巳之歲建安余氏刊。<sup>33</sup>

宋刻本《新雕初學記》的牌記文字云：

東陽崇川余四十三郎宅，今將監本寫作大字，校正雕開，並無訛謬。收

<sup>29</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16頁。

<sup>30</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56頁。

<sup>31</sup>葉夢得撰，《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16頁。

<sup>32</sup>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96頁。

<sup>33</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13頁。

書賢士幸詳鑒焉。紹興丁卯季冬日謹題。<sup>34</sup>

又宋刻本《後漢書》的牌記文字云：

本家今將《前、後漢書》精加校證，並寫作大字鈔版刊行，的無差錯。收書英傑，伏望炳察。錢塘王叔邊咨。<sup>35</sup>

宋刻本《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序後的牌記文字云：

本宅今將監本四子纂圖互注附入重言重意，精加校正，並無訛繆(謬)，謄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得以參考，互相發明，誠為益之大也。建安□謹咨。<sup>36</sup>

以上各例，在用詞上，常見的句子是「精加校正」、「寫作大字」或「大版離開」、「並無訛謬」、「的無差錯」等，這種格式化風格，可用來強調該書校勘精準，這或許也是各店鋪相互模擬的結果呈現。

#### (四)宣傳內容之全

在書業競爭激烈之下，如何能突破重圍，吸引讀者購買，在廣告中以內容之全面為訴求點，是激發閱讀者購買興趣的方法之一。例如：元雲坡刻本《類篇層瀾文選》牌記云：

今將舊本所選古文重新增添，分為前、後、續、別四集，各十卷。前集類編賦詩韻諸雜著，以便初學者之誦習。後、別、續三集類編散文紀傳等作，以資作文者之批閱。先後體制次序秩然，真視舊本大有徑庭。幸鑒！<sup>37</sup>

又明代天啓年間吳縣衍慶堂刻本《醒世恒言》有牌記云：

本坊重價購求古今通俗演義一百二十種，初刻為《喻世明言》，二刻為《警世通言》，海內均奉為鄴架玩珍矣。茲三刻為《醒世恒言》，種種典實，事事奇觀，總取木鐸醒世之意，並前刻之成完璧云。<sup>38</sup>

以上二則皆將該書內容的齊全視為宣傳重點，使不同層次、不同需求的讀者能夠各取所須。

#### (五)闡述不欲私藏之觀念

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著書立說是志業，而非僅為一己之私。所以，藏有珍本秘笈的人，也應將其公之於眾，與眾共之，而不該深藏秘儲，自得其珍。

<sup>34</sup>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803頁。

<sup>35</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12頁。

<sup>36</sup>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47頁。

<sup>37</sup>見袁逸撰，〈中國古代的書業廣告〉，《編輯之友》，1993年第1期，第68頁。

<sup>38</sup>見方遠志撰，《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97頁。



這是一種為整個社會認同的普遍的價值觀念，因此，售書廣告也著眼於此，常以「不欲自秘」、「不欲私藏」、「與眾共之」等語，自表其公心，從而博得顧客的青睞。例如：宋刻《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集》目錄後的牌記文字云：

麻沙鎮水南劉仲吉宅近求到《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計五十七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木以廣其傳，幸學士詳鑒焉。乾道端午識。<sup>39</sup>

又如：明弘治十六年(1503)劉氏溥濟藥堂刊本《類編經驗醫方大成》牌記文字云：

古今醫方汗牛充棟，雖良醫有不能盡閱，閱之有不能盡用者，文江孫氏允賢世為儒醫，每用一方，有驗者必集而類編之，以方名附各門圓散之下，名曰《醫方集成》。意使今之醫者，雖行萬理，不必挾他醫書，而治病之要了然在目，其於活人之心，視杏林陰德不啻過矣。不敢私秘，敬錄諸梓，與天下明醫之士共之。<sup>40</sup>

文末聲明「不敢私秘，敬錄諸梓，與天下明醫之士共之」。此廣告在內容上說明了該書的實用性，且強調是聰明醫生的明智選擇。另外，元天曆三年廣勤書堂刻《脈經》序後的牌記文字云：

天地以生物為心，故古之聖賢著書立論，教人以醫而濟人之生也。得其書而自秘者，豈天地聖賢之心乎？夫治病莫重於明脈，脈法無出於王氏《脈經》之為精密。本堂所藏，不欲自秘，先以《針灸資生經》梓行矣，今復刻《脈經》與眾共之。庶以傳當世濟人之道，且無負古人著書之意云。時天曆庚午仲夏建安葉日增志於廣勤書堂。<sup>41</sup>

這裏不僅大言聖賢著書立說之意，極力宣傳該書優點，並一併廣告已刻之書。

#### 四、結語

現代出版的圖書，幾乎都有版權頁來反映一書的版本情況，且有規範的印刷位置，而古代圖書就不同了。自從印刷術得以廣泛普及和發展之後，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書籍大量印行，各刻書者為了說明自己所刻書籍與別人有所不同，常會在書籍的各個版面中顯示其圖書標誌，牌記的產生，相當於現今的商標和現代圖書裏的版權頁，其內容沒有現代版權頁規範與系統性，然而從其式樣、內容文字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古代在圖書印刷出版的形象設計上，已將文化、歷史與藝術一體呈現。

<sup>39</sup>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1999年)，第8頁。

<sup>40</sup>見戚福康撰，《中國古代書坊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248頁。

<sup>41</sup>《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元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年)，第156頁。